

南帆

程巍

朱大可

吕新雨 韩

索飒 全

胡坚 马也

沙西·萨罗

巴尔加西·略萨

潘维 朱苏力

刘康 张慧敏

张汝伦

崔之元

耿占

李少君

朱苏力

卢周来 成庆

孙立平 韩德强

刘军宁 康晓光

许纪霖

◎ 南帆等著

# 符号的角逐

天涯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南帆等著

# 符号的角逐

I267  
NF2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符号的角逐 / 南帆等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8.5

(天涯文丛)

ISBN 978-7-5399-2899-9

I . 符... II . 南...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56883 号

**书名** 符号的角逐

**著者** 南帆等

**责任编辑** 黄孝阳

**责任校对** 二木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 南京通达彩印有限公司

**经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本** 652×960 毫米 1/16

**字数** 330 千

**印张** 23.25

**版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2899-9

**定价** 28.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目 录

- 符号的角逐 ..... 南帆(1)  
奢侈:商品的象征价值的消费 ..... 程巍(22)  
色语、酷语与秽语 ..... 朱大可(35)  
超级女声的几个关键词 ..... 肖慧(47)  
“孽债”:大众传媒与外来妹的上海故事 ..... 吕新雨(58)
- 世界的疾病 ..... 韩毓海(82)  
从“他人”到“我们” ..... 索飒(91)  
全球化:一个现代咒语 ..... 金安平(103)  
全球化背景下的英语帝国主义 ..... 胡坚(111)  
怀旧与终结 ..... 马也(118)  
全球化与人类想象 ..... 沙西·萨罗尔(147)  
全球化:文化的解放 ..... 巴尔加西·略萨(158)
- 理想主义与大学 ..... 潘维(165)  
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建构 ..... 朱苏力(181)  
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现代性 ..... 张汝伦(205)  
人文思想的实践与消费 ..... 耿占春(217)  
向权力说真话 ..... 刘康 张慧敏(226)  
彻底的自由主义必须关心公益 ..... 崔之元(241)

我所知道的 NGO .....	李少君(250)
·关于民族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札记 .....	卢周来(259)
读经运动与政治保守主义 .....	成 庆(275)
九十年代以来社会分层的三大趋势 .....	孙立平(279)
重新认识中国历史 .....	韩德强(295)
开放的传统:从保守主义的视角看 .....	刘军宁(327)
软力量建设与儒家文化复兴 .....	康晓光(341)
世俗社会的中国人精神生活 .....	许纪霖(350)

## 符号的角逐

南帆

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以及结构主义之后，文本分析成为一个众所周知的批评策略。大批理论家共同将语言形容为文学的主角，心理、哲学思想或者主题类型的意义退居次要。文本是语言编织物，因而文本隐藏了文学的首要秘密。肌理，张力，象征，叙事模式，还有无所不在的结构——一系列新型的理论概念进驻文本，条分缕析，剔精抉微。这些概念对于文本外部的历史语境置若罔闻；或者说，这些概念隐含的前提即是，文本的结构与外部的历史语境无关。对于文学说来，语言的秘密与社会历史的秘密不可通约。

然而，二十世纪的后半个世纪，这种狂热一时的理论倾向逐渐遭到遏制。文本与社会历史的关系再度浮出水面。不考虑书面文字与口头传播的差异，单纯的文本分析怎么能说明古典诗词的精粹和话本的缓慢松弛？解释电视肥皂剧拖沓的修辞风格，人们必须回到早期的历史——那时的观众定位为午后忙碌在厨房与客厅的家庭主妇，她们无法在操劳的间隙跟上一个紧张的故事；然而，赞助电视制作的广告商不得不竭力讨好她们，因为家庭主妇掌握了大部分的采购权。总之，文本生产不仅局限于语言作坊内部，社会历史可能对文本的每一个细部产生压力。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对于文本成规以及叙事、修辞的隐蔽控制引起了理论的持续关注。如何叙事成为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人们逐渐意识到，愈来愈多的文本占据了生活，并且主宰或者规约、支持种种生活的想象。很大一部分生活即是“叙事”的产物。换一句

话说,文本既是社会历史的符号凝结;同时,文本又织入社会历史的一个个角落,形成种种压力,这些压力循着不同的方向扩散至现行的社会历史结构。这个意义上,文本生产不可避免地与各种权力体系产生互动。文本以及符号被动员起来,有效地维持或者破坏某种等级制度,并且由于特定集团、阶层、群体的要求和使用形成独特的风格。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以及结构主义曾经把文本供奉为一个孤立封闭的神秘王国,孤立、封闭、不可再分解即是文本拜物教的依据。这仿佛证明,是独一无二的文学性而不是别的什么决定了文本的结构。然而,现今的理论发现,文本并没有甩下社会历史;文本的结构隐藏了强大的历史根源,而且,文本可能产生的社会功效远远超出通常的想象。

晚近兴盛的“文化研究”有力地支持了这种观念。文化研究的分析范围早已突破了文本的藩篱,建筑、舞蹈、海报、经济学著作的修辞特征、博物馆陈设、电视肥皂剧、侦探小说、电子游戏以及体育赛事无一不能装入文化研究的百宝箱。有趣的是,文化研究时常对上述领域作出符号学的解读。许多时候,文化研究毋宁说将世界当成了一个大型的文本——人们时常遭遇“社会文本”这个象征性的概念。世界的大型文本内部包含了无数次级文本。电视、报纸、广告、杂志、广播、互联网等大众传播媒介密集地包围了人们,后现代社会的特征即是将主体抛入形形色色的文本之间。置身于这个世界,人们的身份、社会地位通常是被“叙事”出来的。种族、性别、阶层、尊严、荣誉,何谓成功、何谓时尚、何谓可耻、何谓无能——诸如此类的知识精密地构成了一个主体的定位。反之,如果一个主体拒绝认同社会定位,那么,他首先可能拒绝既定的叙事。这时,一种复杂的争夺、冲突、压迫、反抗、解放将在符号领域展开。显然,这里所谈论的符号不仅是能指与所指的单纯合作,不仅显示出单纯的指示功能。符号愈来愈明显地成为一种可观的生活资源。符号可能是某种昂贵的商品,形成庞大的产业,也可能是极富杀伤力的政治工具。因此,如何制作符号、收集符号、占有符号,如何使用符号巧妙地叙事,这是事关重大的社会活动。许多时候,掌握符号也就是掌握权柄;深刻地解读符号可能揭破某种秘密的圈套,也可能掘出某种革命的资源。

沃卓斯基兄弟导演的《黑客帝国》肯定可以成为文化研究所钟爱的话题。这部科幻影片虚构了一个古怪的情节:未来的人们困在一个符号的世界

而无法自知。这些人的日常见闻无非是一台巨大的计算机虚拟出来的世间万象。一切幻象都是程序的产物。影片之中，英雄主角的动机就是冲出符号的迷惑，逃离数字化的统治。这显然是一个不无哲学意味的时髦主题。沃卓斯基兄弟是鲍德里亚的忠实信徒。有消息说，他们甚至邀请鲍德里亚出任影片之中的一个角色。不难发现，《黑客帝国》是鲍德里亚某一方面思想的通俗版本。鲍德里亚激进地声称，后现代社会业已被技术和传媒严密控制，符号、影像和代码充斥整个社会，真实与非真实之间的明确界限消失了。人们习惯于透过种种特殊的传媒观察世界、熟悉世界、掌握世界，传媒所演示的符号结构理所当然地成了现实本身——甚至比真实还要真实。人们无限地依赖电视，依赖互联网或者报纸，挣脱或者抨击一种传媒之后无非是投入另一种传媒。只有借助传媒的拐杖，人们才可能想象社会，进而想象自己的位置，决定怎么说和怎么做。这些符号体系是否某种真实的指代已经不太重要——它们有时甚至与真实失去了任何联系；重要的是，这些符号自身成了主体，互相勾结，并且作为一种商品拥有了经济交换价值。这是能指的自主化，能指成为自己的指涉物，同时倾入经济流通领域。很大程度上，符号形式开始覆盖了商品形式。商品的物质属性愈来愈少，符号形式已经足以挑起人们的购买欲望。扛一袋米或者提一条猪腿的景象正在减少，许多时候，人们消费的是符号形式。“虚拟经济”一跃成为现今风头正健的概念。期货、股票、广告、转账、信用卡，诸多交易在符号领域出没——货币本身即是最为权威的符号作品。后现代社会的标志之一即是——无远弗届的符号覆盖。后现代转向可以视为符号运作的一个历史性后果。电子传媒正在制造“无地方特性”的图像地理和虚拟地理。传统的自然地理形成的种种坐标体系陆续失效，远和近、深和浅、旧和新等一系列空间感和时间感开始动摇——这种迷惘和恐慌即是后现代的典型经验。人们的周围莫非符号形式，真实与幻象、文化与自然的二元论终于瓦解。这个意义上，人们只能栖身于一个没有起源、没有指涉点的多维空间。<sup>①</sup>符号之外一无所有，这就是鲍德里亚提供的一个不无诡异的理论图像。

许多人觉得，鲍德里亚的理论图像多少有些危言耸听。相对地说，斯图尔特·霍尔对于构成主义的阐述似乎更为中肯。霍尔不再纠缠于真实与幻象的二元论，他的理论焦点转向了“意义”。意义使现实成为可解的形态。无论

真实与否,形形色色的“意义”是支配生活的核心:“它们组织和规范社会实践,影响我们的行为,从而产生真实的、实际的后果。”<sup>②</sup>索绪尔以来的一系列理论遗产证明,语言、符号的运作——霍尔的术语称之为“表征”(represent)——决定了意义的生产。这再度证明了符号在社会生活中心的决定性作用。霍尔总结了人们解释“表征”(represent)的不同理论:“反映论的或模仿论的途径提出词(符号)和事物之间的一种直接和透明的模仿或反映关系。意向性的理论把表征限制在其作者或主体的各种意向中。”<sup>③</sup>霍尔主张的构成主义源于社会知识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转向——话语转向。构成主义看来,意义不是先验地存在于某种事物之中,等待一个外部的“发现”或者垂顾,意义是在人们认识某种事物的同时被生产、被建构出来的。语言符号支持了这种生产或者建构的实践。语言符号的成规惯例设定了事物如何呈现,同时设定了意义解读的基本框架。这时的符号与事物之间远远超出了单纯的指代关系,符号自身所构成的表征系统内在地控制了人们的认识程序,组织人们的认识视野——包括认识一些抽象的甚至纯粹虚构的概念,例如幸福、友谊或者天使、恶魔、地狱,如此等等。霍尔解释说,所谓的“表征系统”“并不是由单独的各个概念所组成,而是由对各个概念的组织、集束、安排和分级,以及在它们之间建立复杂联系的各种方法所组成。”<sup>④</sup>换言之,事物的意义就是在这种“复杂联系”之中逐渐敞亮,并且成为一个严密的、相互呼应的系统。霍尔即是在这个意义上为福柯辩护。福柯并未否认,事物存在于话语之外,但福柯论证了“在话语以外,事物没有任何意义。”<sup>⑤</sup>“意义有助于建立起使社会生活秩序化和得以控制的各种规则、标准和惯例”——所以,霍尔同时意识到:“意义也是那些想要控制和规范他人行为和观念的人试图建立和形成的东西。”<sup>⑥</sup>这也是人们将语言符号的运作纳入权力运作的理由。从历史的叙事到民族的想象共同体,从简赅的标语口号到繁琐的仪式,对于权力运作说来,语言符号的能量始终不亚于暴力武器。当然,并不是所有擅长使用符号的人都能意识到这一点。作家号称语言大师,但是,许多作家对于语言符号的历史使命并没有清晰的认识——他们似乎更乐于接受这种浪漫主义式的形容:一个人的语言才赋是一种天生的感觉,这种天生的感觉驱动作家援笔疾书。语言无非是一种称手的工具,负责滔滔不绝地演示作家的奇妙灵感。如同穿上了红舞鞋的舞蹈家,作家不会也不可能停止写作。目前,只有韩少功

的《暗示》对于自己手里的语言——更大范围内，包括各种符号体系——产生了深刻的怀疑。韩少功的《暗示》流露了一种恐惧：他担心陷入语言以及种种符号体系如同陷入某种迷魂阵，人们徘徊在一系列语词和虚拟的影像之间，再也回不到土地、阳光、潺潺流水和风花雪月的真实世界。令人忧虑的是，符号的世界时常被有意设计为一个不平等的世界。再现什么，遮蔽什么，夸张什么，涂抹什么，《暗示》犀利地察觉到一系列符号运作隐藏的政治企图。我曾经借助《暗示》来陈述这种观点：

现今，情况也许更为复杂：语言符号的占有可能形成特定的文化资本，这将生产出另一种话语权力。无论是支配、榨取、统治、弹压，文化资本的运作正在制造各种崭新的形式。大众传播媒介如此发达、语言符号如此丰富的时代，一批人运用语言符号压迫另一批人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种种语言符号体系之中，某一个阶层或者某一个族群的形象可能大幅度扩张，他们的声音回响于整个社会；相形之下，另一些阶层或者族群可能销声匿迹，既定的语言符号配置之中根本没有他们的位置。尽管他们人数众多，然而，语言符号的空间察觉不到他们踪迹。可以说，这是继经济压迫、政治压迫之后的语言符号压迫。在我看来，这是《暗示》之中另一个更为重要的主题。

路易·阿尔都塞对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论述已经广为人知。这是与强制性国家机器相对的另一个领域。强制性国家机器呈现为暴力压制形式，军队、警察、法庭、监狱、政府和行政部门均是暴力的执行机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一种软性的规约或者训诫，例如宗教的、教育的、家庭的、法律的、政治的、工会的，它们的指令往往呈现于报纸、电视、广播、文学和艺术、体育运动，如此等等。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负责质询、规训主体，告知个体如何扮演一个合格的主体。尽管阿尔都塞未曾进一步论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有效操作即是依赖各种符号体系，但是，人们完全可以想象符号的威力——这时，符号的功能可以与机枪、大炮、高压水龙头与铁丝网相提并论，甚至产生后者所无法企及的效用。

统治阶级的思想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统治地位的思想有力地规训主

体，维持既定的社会关系，这一切均要由庞大的符号体系运作给予保证。从宗教、哲学、法律到文学，这包含了一系列观念的确认，也包含了种种感觉的训练。我在《文学的维度》之中指出了符号、社会与主体的互相缠绕：“马克思曾经提出了著名的结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话语分析的意义上，人们有理由继续这样的结论：主体同时还是诸多话语关系的总和。”<sup>①</sup>

这即是符号生产所隐藏的政治意义。相对于符号的生产，符号的消费通常集中于大众传媒，出版物、电视以及互联网均是出售文本的大型超级市场。所以，大众传媒可能大面积地参与了社会关系的组织、平衡、修复或者破坏。大众传媒一般掌握在拥有各种特权的人物手里。与权力共谋，维护稳定的现状，训练合格的主体，大众传媒通常担当了一个得力帮手的角色。

当然，这并不能证明，大众传媒是一个波澜不惊的海域。力比多涌动不歇，主体规范不时遭遇挑战。压抑与反压抑的激烈角逐形成了符号与文本的激烈角逐，这一切都将在大众传媒刀光剑影地持续上演。种族、性别、阶级、阶层，各种族群或者文化共同体纷纷涌入大众传媒，征用、调动各种类型的符号，竭力发出自己的声音。悬殊的经济地位无疑是意识形态分歧的重要基础，但是，符号与文本的激烈角逐同时包括了大量文化因素——这甚至很大程度地削弱了经济决定论。符号与文本的角逐扩散到日常生活的诸多角落，一点一滴地改变人们的感觉。这种状况令人想到了福柯所说的微型政治。一个风格独异的先锋小说文本、一个实验性剧本、一个别出心裁的网站或者一段古怪的街舞，这些特殊的符号都可能象征某种叛逆，或者解构某种传统的意识形态观念——尽管它们对于现存经济基础的瓦解可能微不足道。对于许多知识分子说来，参与革命的激情与其说源于赤贫的经济状况，不如说源于某种符号体系的号召。这证明了符号体系的独立意义。另一个证明可以追溯至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葛兰西察觉到一种可能性：现存经济基础未曾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统治阶级可能在文化领域作出某种妥协，出让一定的符号空间，允许被统治阶级抛头露面。这或许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退让，或许是维护现存经济基础而设置的缓冲。无论如何，符号领域的压迫和反抗显示出比经济领域更为纷杂的局面。

《黑客帝国》之中的英雄主角为什么急于从虚拟的图像之中突围？这里肯定隐含了一个对比：符号领域远比自然王国凶险。相对于自然万象，符号王国隐藏了种种狡诈、陷阱、劝诱和胁迫。自然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无论是日月星辰还是河流山川，自然的形成不存在取悦某些族群同时非难、压迫另一些族群的意图。走出神话时代之后，也就是人类从自然王国分裂出来之后，自然已经不可质疑。没有人因为天上只有一个太阳或者太平洋如此浩瀚而愤慨，也没有人猜测西伯利亚的寒流或者毁灭性的地震源于某种不可知的阴谋。然而，符号领域是一个人为的世界——来自某些人的设计、制作和生产，实现了某些人的意图，并且对于某些人产生了或者明显或者隐蔽的效果。符号擅长变魔术。符号可能夸大某些形象的比例，遮蔽或者盗走另一批人的生活——符号的修饰和删改可能形成一种虚假的意义。那么，谁在操纵这个领域？谁有权力、有资格操纵这个领域？这个领域的设计以及产生的效果对哪些人有利，同时损害了哪些人？栖身于符号的世界，这成了一些不可避免的基本追问。

农业文明时代，自然在人类的生存之中占据了很大的比重。土地无疑是自然的代表。自然不仅是人类的生存环境，也是美学的对象。古典诗词之中，飞花、落木、青峰、皓月无一不是自然意象。现代社会来临的标志之一是，大规模剧增的符号淹没了自然。科学技术、经济、财富所制造的历史革命最终由一系列符号表述出来。符号成为生存必须进入的一张巨大网络，现代生活愈来愈多地演变为符号生活。文本、影像、斑斓的色彩和悦耳的音响，这些以表意为主的符号体系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化空间，历史、艺术、形形色色的哲学观念、数学和物理学理论均是这个文化空间的美妙图像；另一方面，构成日常现实的物质世界——尤其是都市社会——通常展示为另一套符号。物质世界不仅拥有具体的用途，例如御寒或者遮风避雨，同时，它们还表示种种复杂的象征含义。无论是服装、首饰、家居设计还是街道装潢、旅馆的异域风情、汽车的奇特造型，物质世界的确是另一种“社会文本”。卫慧的《上海宝贝》之中，物质的符号炫耀是一个巨大的乐趣。叙述人喋喋地卖

弄种种商品的品牌知识,从汽车、化妆品、饮料到外套与内衣。显而易见,这些品牌形成的符号体系无言地展示了某种智慧们所认可的生活品质。更大范围内,种种符号体系可能共同叙述特定阶段的历史文化特征。考察西方的现代性话语如何登陆上海的时候,李欧梵的《上海摩登》涉及多种符号体系。除了刊物、教科书、画报、广告、月份牌——除了对于现代性建构产生了莫大作用的印刷文化,《上海摩登》还谈到了外滩众多带有各种殖民印记的建筑物,谈到了百货大楼、咖啡馆、舞厅、公园和跑马场以及石库门的“亭子间”。这些物质世界镌刻了种种特殊的生活观念,“现代性”浮动在这些观念的深处,相互呼应。解读这些交错的符号,也就是解读历史是由哪些人制造出来的。

运用符号制造历史,这是一个巨大的、意义深远的工程。人们必须从这个意义上解释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性。这个不可让渡的权力是统治权力的组成部分,统治阶级掌控符号生产是持续统治的前提。这个问题上,强制性国家机器必然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缔结成坚固的联盟。当然,摧毁现存的统治也是如此——异国军队的入侵从来没有忘记占领广播电台和电视台。许多时候,统治阶级对于符号的掌控深入到修辞、叙事以及文本结构,但是,这种掌控大部分是隐蔽的,并且尽量考虑到文类的既定特征。这是意识形态形成的基本条件——非强制性的,甚至是富有魅力的解说和训诫。例如,对于现代社会,新闻和历史是至关重要的两个叙事文类——两个维度的叙事交汇恰如其分地划出了人们想象社会的逻辑。通常,统治阶级不会对新闻和历史的“真实”原则表示异议——“真实”即是新闻和历史的文类声誉。权力的影响毋宁说发生在另一个幽暗的层面:什么叫做“真实”?纷纭的表象歧义百出,误读和骗局层出不穷。这时,只有特定的目光和理念才可能识别显现了“本质”的“真实”。权力负责指定“真实”的含义,并且运用一系列有效的修辞和叙事再现这种“真实”,这是权力与符号之间常见的合作方式。

当然,“文类的既定特征”并不是来自教科书的几条刻板的规定。这意味着各种符号的基本性质及其潜藏的丰富表现力。诗、音乐、绘画、电影——作家和艺术家对于各种符号体系的运用曾经产生震撼人心的强大效果。在这个意义上,现今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均是擅长符号操作的专业人员。无论维护还是破坏现存的意识形态,符号操作是他们常规的效力方式。电子传播媒

介——例如电影、电视、互联网——诞生之后，符号的制作、生产、传播带有更大的技术含量；从导演、摄像、演员、主持人、播音员到影像剪辑人员、软件编写人员、机械维修人员，符号生产者的队伍持续扩大。符号的完美生产是种种意识形态意图充分实现的最终环节。艺术自律、纯诗或者文学到语言为止，这些响亮的口号、命题企图将政治或者别的什么观念远远地抛出作家或者艺术家的视域之外。浪漫的文人试图把历史性的分工陈述为某种天命——只有异秉或者天才方能承担如此玄奥的使命。然而，如同伊格尔顿在《美学意识形态》之中所分析的那样，美学业已成为规训身体和感觉的意识形态之一。一些“纯粹”的艺术符号熠熠发光地存在于超历史的文化真空，这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幻觉。如果人们意识到，知识分子是意识形态生产的技术骨干，那么，不可替代的专业技术将使他们在文化领导权的构成之中占据一席之地。这可能预示了知识分子与权力的新型关系。

资本成为介入文化领导权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是现代社会愈来愈普遍的情况。对于古人说来，吟诗弄赋、说书唱戏的成本十分低廉，刊刻文集的费用略高一些。相对地说，现代出版行业的资金或者维持电视台正常运转的开支几乎是天文数字。更为重要的是，现今的文学和艺术已经自觉地纳入经济领域，甚至形成报酬可观的文化产业。无论是作家、导演、演员还是投资商，各方无不期待从经济活动之中分一杯羹。如果说，真正的作家或者艺术家还有可能因为某种激情而义无反顾地焚烧自己，那么，赢利是投资商的唯一动机。精明的商人不会将资金注入一个注定没有市场的作品。资本的天命就是利润。对于电影或者电视剧这些成本高昂的作品说来，投资商手里的资金主宰着它们的命运。资金拥有的发言权越来越大，甚至君临一切。许多导演遇到类似的尴尬：由于投资商的威胁，他们不得不为投合市场而放弃个人的独特风格。某些时候，资本直接现身符号领域——商业广告。再也没有哪一种符号形式比广告更为典型地体现资本的权力。

强制性国家机器、知识分子的专业技术、资本——这些因素不是孤立地对符号生产发生影响，它们之间形成了复杂的历史性互动。借用皮埃尔·布尔迪厄的术语表述，“场”可以成为人们考虑问题的基本概念。“场”是一个富有空间意味的概念，布尔迪厄运用这个概念描述多重力量的等级、位置以及形成的空间结构。在他看来，这个概念的覆盖有助于解除“内部研究”与

“外部研究”的传统疆界。“场”所描述的空间之中，这些因素既相互合作又相互抗衡，最终的合力传送到符号生产领域，巩固或者改造了诗的结构、电视肥皂剧的情节设置或者酒吧的内部装修风格。布尔迪厄充分意识到符号生产者、统治者、物质利益、象征利益或者文化资本、经济资本之间的纷杂头绪，并且揭示了文学场的独立性吁求背后所包含的秘密回报。某种意义上，那些拒绝外在指令的作家与投资商殊途同归：

在一个极点上，纯艺术的反“经济”的经济建立在必然承认不计利害的价值、否定“经济”（“商业”）和（短期的）“经济”利益的基础上，赋予源于一种自主历史的生产和特定的需要以特权；这种生产从长远来看，除了自己产生的要求之外不承认别的要求，它朝积累象征资本的方向发展。象征资本开始不被承认，继而得到承认、并且合法化，最后变成了真正的“经济”资本，从长远来看，它能够在某些条件下提供“经济”利益。⑧

这一切无不显示了符号生产与权力、资本以及种种利益集团的联系，显示了符号生产的意识形态根源。但是，意识形态的一个诡异之处就在于，竭力掩盖这种联系与根源。这种掩盖的策略是，将符号形容为现实世界的一个中性的、客观的再现。符号是透明的、纯洁的，分毫不爽地将世界和盘托出——符号就是世界本身。人们使用符号如同使用水、土地那般自然，符号本身不存在什么人为的秘密。当符号开始享受自然的待遇时，针对符号的戒意、挑剔、分析和批判随之消散。符号生产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消失在人们的视域之外。罗兰·巴特的《写作的零度》曾经将这种掩盖视为资产阶级的诡计。在他看来，“现实主义”的写作策略“充满了书写制作术中最绚丽多姿的记号”——现实主义仍然是一套高超的修饰、剪辑、删改和涂抹技巧；但是，作家却声称这是一种如实的反映。这是伪装质朴、自然的表象——而非人为的加工——逃避批判的锋刃。现实主义试图形成一个印象：作家无非是记录社会的秘书，勇敢、铁面无私，超然独立于各个利益集团，他们的符号生产不可能受到各种个人意图的干扰。这个时候，符号领域成了一面公正不阿的镜子，文本结构成了世界本身的结构。人们理所当然地觉得，他们看到的是“怎

么样”，而不是“谁”、“如何使之成为这样”。总之，符号的刻意表现被毫无戒心地当成了客观再现时，这种表现所叙述的意义就会得到不知不觉的认可。这是符号领域迄今为止最大的成功。

### 三

一个略为夸张的观点是，掌握符号就是占领世界，占有符号就是占有生活资源。人们对于经济领域的不平等明察秋毫，然而，很少人意识到符号领域的刺眼问题。如同少量的富人占有全世界的绝大部分财富一样，符号领域的贫富悬殊毫不逊色。从符号的占用到符号的传播，只有少数人频频露面，高视阔步；沉默的大多数人仅仅作为一个抽象的背景渺小地存在。许多时候，电视屏幕——符号领域的一个重镇——上的世界仅仅是一些精英人物的世界。这个世界仿佛仅仅由名牌轿车、豪华别墅、酒吧、舞厅组成，种种手握重权的显要分子出入其间，慷慨发言或者举杯调情，轻松地决定多少个亿资金的流向；相对地说，绝大多数庸常之辈一生也不可能拥有半秒在屏幕上露面的机会。尖端技术制造的电子传媒正在急剧地改变传统的认同空间，民族、国界与海关的意义正在削减，但是，电子传媒并未有效地弥合这方面的距离。相反，许多新型的不平等正在被新型的机器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显而易见，经济领域与符号领域的不谋而合并非偶然。

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犀利地解剖了经济领域的剥削和压迫。剩余价值学说披露了资本主义机器轴心巧妙地隐藏的秘密。然而，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鲍德里亚的杰出命题——远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如同资本的秘密运动产生出惊人的效果一样，符号领域的不平等也在多种表象的掩护之下悄悄地进行，例如堂皇的美学运动、令人钦佩的表演技巧或者普遍实行的明星制。浪漫的诗人和落拓不羁的艺术家往往倾心于某种超凡脱俗的气质，符号经济学时常隐没在他们的迷人风度背后。多数读者仅仅对一部名著的情节概要感兴趣而对印数和版税一无所知。符号生产的经济价值无意地成为一个忽略不计的问题。诗人或者艺术家只能偷偷地躲在某一个角落数钱——没有多少人意识到，他们生产的符号也可能是抢手的商品；诗人或者艺术家可以为这些商品讨价还价，他们如同企业家一样生财有

道。引进资金,控制大众传媒,动用宣传机器豪华包装,端足了架势待价而沽——符号的生产和出售复制了资本运作、企业、市场之间的众多伎俩。印刷文化之中,报纸发行与广告的联盟造就了一种新的运行模式,广告商成为市场的重要代理。这种模式在电子传播媒介扩张为一个成功的流通网络。众多偶像明星将他们的形象制作成商品,这些商品通过电视发射台或者计算机互联网输送到每一台终端屏幕。与通常的市场销售相异的是,公众对于这些形象的消费将由广告商付账。为了让偶像明星的形象夹带商品广告,广告商支付的数额令人咋舌。广告商下在屏幕背后的赌注是,这些费用将由成功的产品销售回收。这个循环系统如此神秘,以至于没有人说得清一个偶像明星拍摄几秒钟的广告有没有理由收取如此之高的报酬。报道显示,耐克公司某个年度付给迈克·乔丹的广告费比二万二千名亚洲工人的总工资还要多。这时,人们还有勇气认为这是平等的吗?⑨

当然,更为常见的现象是,符号的大规模占用赢得的是布尔迪厄所说的象征资本。如何把象征资本转变为经济资本,现代社会提供了名与利的兑换率。一举成名天下闻,这始终是一块无比诱人的蛋糕。多数社会通行的法则是,社会名流高踞于默默无闻之辈的头上。如果符号的占用不仅限于数量,而且炼制出一种达官贵人所独享的文本结构,那么,符号本身就可能制造放大、抬高一批人或者压抑、流放另一批人的功能。这种符号可能自动删除那些下贱的身份,封锁异端分子,并且为权贵者预订充裕的空间。如同韦勒克和沃伦所说的那样,古典主义时期,史诗或者悲剧是国王和贵族活动的符号区域,市民或者资产阶级则屈居喜剧之中,至于平民百姓只能逗留在讽刺文学和闹剧的地界。⑩现今,各种文本结构与不同身份级别之间仍然存在不成文规定。通常,头条新闻的主人公不会进入相声遭受调侃,历史著作之中的领袖人物也无缘跨入逗乐的小品出丑。韩少功的《暗示》发现,各种地图——一种表示空间结构的符号体系——隐含了迥异的价值观念:农业时代的地图周详地标明了河流和渠堰塘坝;工业时代的地图热衷于火车和汽车的交通线,星罗棋布的矿区和厂区以及沿海的贸易港口;美洲和非洲许多国界是一条生硬的直线,这是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杰作,他们根本没有耐心考虑殖民地的农业、矿藏、河流、山区以及族群分布对于划界管理的意义;消费时代的旅游地图充斥高级消费场所,星级宾馆、珠宝店、首饰店、高尔夫球